

[图片]卷首语打开时间之门

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却能够借助历史亲近过去的时间。无论是书籍也好，考古器物也好，或是影视剧作纪录片也好，通过历史，我们了解到了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事和物。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历史；在时间的每一条缝隙，都有历史。历史是过去时间发生的事物总和，是文明延续的脉络，是你和我都能触碰和感知到的余温。

当我们打开一册历史类的书籍，也就好像打开了时间之门。进入到了另一个时空，和古人交流思想，向偶像学习艺术，跟先贤争论观点，甚至是坐下来侃大山吹牛逼。在历史的时空中，自由地来去，随意地翱翔，谁能说，这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

好了，闲话打住。截止到2016年11月30日，简书[历史]专题11月份共收录文章1462篇。本期仅从中精选出部分佳作，分门别类，供诸位历史爱好者赏读。

历史专题主编：子曰少怀

[图片]史论：纵横古今谈

寂寞布衣忧国泪

文/我是张望好时光

一

唐天宝五载即公元746年，正月十五上元之夜，春节的喜庆达到了高潮。长安城内火树银花流光溢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观灯的人们倾城而出，车马塞路，人声鼎沸。

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刚刚向唐玄宗进献了对吐蕃作战中的战利品，被加封河西节度使，心情大好。他与刑部尚书韦坚相约，一同前往位于崇仁坊中的景龙道观夜游。

皇太子李亨在随从的簇拥下，也出宫来走马观花，刚巧遇到太子妃的哥哥、刑部尚书韦坚。两人交谈几句后就匆匆分手了。李亨一向谨慎，并不多与朝臣私相往来。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次见面，竟引发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大案。宰相李林甫奏称唐玄宗，韦坚勾结皇甫惟明，欲拥立太子为帝。二十一日，韦坚被贬为缙云太守，皇甫惟明被贬为播川太守，后又被赐死。

太子李亨不寒而栗。九年前，父皇唐玄宗一怒之下，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同时废为庶人，并在同日将三人赐死，他被推上太子之位。从那时起，他的生活中就各种明争暗斗险象环生。为摆脱与韦坚的干系，他立即以“情义不睦”为由，与韦氏离婚。同年十一月，李亨又被牵连进一桩“亡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的案子，为表明清白，他不得不与自己的另一名姬妾杜氏离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亨知道，针对自己的这两起大案背后，站着同一个对手李林甫。

李林甫是唐朝宗室，734年为相。他会钻营，善机变，具有相当的行政才干，《旧唐书李林甫传》说他“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当年，玄宗因宠爱武惠妃，想改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宰相张九龄讲了一番道理后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同样的事情摆到李林甫面前，他说：“这是皇上的家务事，不需要和别人商量。”对双方的争斗，端坐在皇位之上的玄宗心知肚明。但一方面，他认为李亨仁孝恭谨，勤奋好学，是合适的储君之选；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太子羽翼丰满、势力扩张，所以并不明确制止。无论对国事的掌控还是对时局的判断，他都拥有绝对的自信。

玄宗是靠自己的胆识和才能，在各方激烈的角力中取得皇位的，并亲手缔造了开元盛世的辉煌，社会富庶繁华，一片欣欣向荣。但宵衣旰食三十年，他有一些倦怠了，这位著名的艺术家皇帝，内有杨贵妃这样的佳人侍侧，芙蓉帐暖，外有李林甫这样的宰相委政，恭顺精干，他乐得高居无为，伴美人，选乐工，设梨园，纵情于歌舞游乐的温柔乡中。

朝堂之外，两年前被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却焦急而痛心，他奋笔疾书：“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国君若失去了贤臣的辅佐，就会像神龙化之为凡鱼；奸臣一旦把持了大权，就会由老鼠变成猛虎。庙堂之上，也不是无人看得出盛世之下隐忧渐生。最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就曾向玄宗皇帝进言：“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但玄宗略一沉吟，即一笑而过。

从开元的清明治世到天宝的歌舞升平，大唐帝国盛之又盛的花团锦簇，令人目眩神迷。这些清冷的声音，听起来多像是杞人忧天。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三十五岁的杜甫来到了长安。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杜甫的自述。但是，开元天宝年间，诗坛群星闪耀。杜甫之前，大他11岁的李白，已创造出布衣入宫、君臣相得的奇迹，被天下读书人津津乐道。杜甫之后，白居易29岁收获“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得意，王维21岁就“大魁天下”，身骑白马插花游街，赶赴琼林宴会。

杜甫来到长安之前，在天宝三载至天宝四载间，曾与李白同游梁宋和齐鲁。他们一起打猎骑马，追鹰逐兔，一起寻仙问道，痛饮狂歌。他敬佩李白的才华，钦慕李白的潇洒，但李白已在翰林供奉的职位上，见识过金堂玉马的权贵核心，他是要继续寻仙问道的，杜甫则心忧前程。所以，在李白“脱身金马门，独去讨幽隐”的时候，他选择了西去长安求仕。

二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这一年有三个年号：正月，睿宗改元太极，五月又改元延和，八月，玄宗登基，改元先天。

杜甫自小多病，母亲又去世得早，被寄养在洛阳的姑母家里。三岁时，他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疫病，姑母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儿子却丢了性命。为此，他一辈子将姑母视同亲生母亲。

传统的仕宦家庭让杜甫得到了很好的教育，除了读书、写字、作诗，还有机会接受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熏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音乐家李龟年的演唱，晋人顾恺之的绘画，在数十年之后，还给他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杜甫最为推崇的，是十三世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杜预为西晋名臣，曾任镇南大将军，政事、武功、学术震耀一时，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被后人收入《十三经注疏》。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做过膳部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等，少时便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工于五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先祖留给杜甫的还有传统儒家的刚烈和孝行。他的叔父杜并十三岁为报父仇而杀身，是震惊朝野的孝子；他的外祖母草鞋布衣为蒙冤入狱的父亲送衣送饭，被誉“勤孝”，其年幼的兄弟崔行芳要求给二哥代死，没有诏准，就同哥哥一起就刑，被称为“死悌”。曾三次为相的著名文学家张说在《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中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杜甫对自己的出身深感自豪，把奉儒守官和饱学诗书视为家族传统。他屡次夸耀“吾祖诗冠古”，又教育儿子说“诗是吾家事”，他的勤奋苦读更是有目共睹，李白就曾打趣他说：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十八九岁起，他南游吴越，北游齐赵，纵横于名山大川和通都大邑，饱览名胜，结交友朋，感古怀今，广增见闻，度过了十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

如果说十年磨一剑，那么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天宝六载（747），玄宗诏求天下士子，只要精通一艺，便可到长安参加制举。杜甫满怀希望地参加了考试，但是，刚刚制造了不少冤案的李林甫，担心这班人录取之后会任意批评朝政，对自己不利，所以全部不取，反而向玄宗上表称贺，称“野无遗贤”。

如果说开元二十三年（735）第一次参加科举落第，杜甫还能因来日方长而不太在意，那么这一次的无缘朝堂，对他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之前，杜甫虽也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辛酸，但因为有中举得官的希望鼓舞着，不论自己还是权贵，都还有所期待。现在，他自己的希望破灭了，权贵们也渐渐失去了好脸色。

“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科举的仕路不通，杜甫只有四处献诗，求人提携。但从朝臣到武将，没有一位大人物愿意引荐他。751年，玄宗举行庆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及天地，杜甫抓住机会，一口气献上《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三大礼赋。《新唐书·杜甫传》浓重地记下了一笔：“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但宰相李林甫并没有给杜甫机会，最终只得了一个“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的资格。

在唐代，科举与荐举并行，干谒之风特盛。高适就曾大胆表白：“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但杜甫看起来太着急太用力了，甚至曾向接替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及其党羽鲜于仲通作诗投赠，希望汲引，为此遭到不少讥讽和冷落。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他的父亲死在奉天县令任上，杜甫的生活日益窘困，心情也愈发沉重。

他曾与朋友一起登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塔，写下“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慈恩寺是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太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为母亲文德皇后祈福而建，既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场所，又是唐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个象征。穷愁潦倒、衣食艰难的诗人，登到高塔上，感受烈风飞扬，怎能不忆起大唐帝国的清明治世。而如今玄宗“仗内斗鸡催赐锦”，任由权臣把持朝政，上有杨国忠一人担任五十多个官职，下有安禄山被赐铁券、封王爵，那些趋炎附势的人，只顾追逐私利，谁将国家放在心上呢？杜甫眼中，唐帝国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了，可是这种忧心何处可诉、谁人可解？

“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失望之际的杜甫开始为隐居做准备，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在郊区买了房，把妻儿接来同住。为了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杜甫“卖药都市，寄食朋友”，还与贫民挤在一起去买太仓的减价米。

见识过富人的金碧辉煌，也体验过贫民的饥寒交迫。站在咸阳桥头，看着士兵们一拨又一拨，“被驱不异犬与鸡”，与爷娘妻子痛哭相别，去为皇帝开疆拓土；看着曲江河畔踏青的达官贵人，衣着华丽肴馔精美，却“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杜甫奋笔疾书“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这有悖常情的呐喊，却是盛世实景，杜甫的忧虑又重了一层。

天宝十三载（751）秋，长安一带阴雨成灾，一连下了六十多天，农田被淹，房舍倒塌，关中大饥。但杨国忠对玄宗谎称“雨虽多，不害稼也。”并指使御史弹劾上报水灾的扶风大守房琯，所以“天下无敢言灾者。”民众顾不得严冬将临，抱着衣物和被子换米吃。杜甫也不得不把家小送往奉先，寄寓在县署公舍。

752年，李林甫死，杜甫已经四十岁了，终于得到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八品官职，有了一点俸禄。他急急忙忙冒着严寒赶往奉先探视家小，可是一进家门就遭到了一个重大打击：他最小的儿子饿死了。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谁能想到今年是个丰收年，我的儿子还会饿死，杜甫又愧又恨。可是该恨谁呢？自己虽是个小小的八品官，但可以不服兵役和徭役，不交任何租税，结果儿子还是饿死了，那些贫穷的老百姓又怎样活下去呢？他私心自比是要做稷和契的，使天下人人可以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使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贤，使败坏的世风恢复到淳良和美好。可是，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他除了眼看着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还能做什么？大乱已在酝酿，却无人警醒，他的忧愁千重万叠，高过终南，茫茫无际。

三

杜甫的忧思并不多余。当他路经骊山时，当玄宗与贵妃在华清宫尽情享乐时，渔阳鼙鼓已接天而起。二十万铁骑杀向洛阳和长安，屠城，烧房，奸淫，抢掠，无恶不作。

六月，潼关失守，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为唐肃宗。杜甫拖儿带女，随着逃难的人群穿行于深山野谷，幸亏表侄王砅和彭衙县尉孙宰的帮助，一家人才艰难地到达到鄜州羌村。

国破日，万事哀。那么多的朝廷重臣向安史叛军投降了，杜甫区区一个八品小官，却要冒死找到皇帝，因为皇帝即是国家。他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被叛军俘往沦陷了的长安。所幸他官阶低，又不很出名，没有被严格看管。至德二载（757）四月，社甫终于有机会从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两军对峙的前线，逃到了肃宗朝廷所在的凤翔。

被困长安近一年，杜甫亲眼看到这个繁华富庶、万国来朝的国际大都市，如何变成杀人盈城、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亲眼看到唐军与叛军激战于陈陶，“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悲壮和惨烈。

当他麻鞋破衣拜见肃宗，君臣相对，不禁涕泪交流。这一次，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指出他的疏漏。

杜甫做了谏官，就要尽他的责任。不到半个月，房琯因兵败罢相，贬太子少师。杜甫上疏为他辩护，肃宗大怒，幸亏宰相张镐的营救，才免其罪。但肃宗从此以后就疏远了杜甫，到八月间便让他离开凤翔，往羌村探家。

多事之秋，用人之际，皇上却开恩让他探家，杜甫感到深深的失落和无奈。当他在兵荒马乱中突然出现在妻子面前，听到她惊呼：“你还活着呀？”才终于掉下了眼泪，看着妻子穿着用碎布头缝补而成的百结衣，儿子脸色比雪还要苍白，女儿缀满补丁的裤子连膝盖都没过去。

杜甫深深怀念“公私仓廪俱丰实”和“男耕女桑不相失”的开元盛世。那个并未对他施以青眼的唐玄宗，被多少人斥为荒淫误国，只有杜甫在《北征》中替他回护，说他所以赐妃子死，并非被逼无奈，而是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他是多么希望，满目疮痍的大唐，会再现一位英明雄武的帝王，会再创一个清明辉煌的盛世。

至德二载（757）十月，肃宗和太上皇玄宗先后回到长安，杜甫闻讯，欢欣鼓舞。十一月，他携家返回长安，仍任左拾遗。

长安刚刚收复，叛乱尚未平息，朝廷要面对多少严重的问题。杜甫早出晚归，不断地给皇帝上疏谏事。可肃宗关心的是如何清除前朝遗老，排除异己。玄宗已被软禁在深宫，与他关系密切的大臣，都受到了疏远或罢免。

本以为在朝廷中有了一个位置，就能实现自己“致君尧舜”的理想，现在，杜甫彻底失望了。他常常一个人跑去喝闷酒，尽醉方休。没钱买酒，就把冬天的厚衣服当出去，没得当了就赊账，曲江边上的酒铺子被他赊遍了，走上几步就会遇到债主。乾元元年（758）六月，房琯被贬为豳州刺史，与房琯关系密切的严武等人也被贬外任，杜甫也被贬为司功华州参军。

站在金光门前回望，想到去年正是从这个门逃归凤翔的，杜甫一定有万千的感慨，但他的本色不过是一介书生，他所秉持的只有一支笔。

乾元二年（759）三月，杜甫自洛阳老家探亲后返华州，时值唐军与安史叛军决战溃败，洛阳及附近地区陷入战乱。从新安、石壕村至潼关，沿路民不聊生的惨状，铺叙成杜甫笔下著名的“三吏”“三别”。

《新安吏》写的是哭声。官府征兵，成年的“丁男”已被抓尽了，身材矮小的男孩也得去当兵。“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孩子早已走远，哭声却犹在耳边。《石壕吏》中的官吏不再按帖选丁，而是不分男女老幼地“捉人”。石壕村一户人家“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杜甫连宽慰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潼关吏》夸耀城防的坚固，杜甫不忘告诫他们一定慎之又慎，不要再犯哥舒翰的错误。“三别”是一个暮婚晨告别的新婚妻子，送自己的丈夫上前线，一个子孙阵亡尽、走路都需要扶杖的老翁被征入伍，与老妻惜别，一个刚从战场返家的士卒，又接到官府要求参军的文书，连个告别的对象都没有。

遍地烽火，谁能置身于外？对于唐王朝平定叛乱、维护统一的战争，杜甫是坚决拥护的。但对百姓在战争中的惨重牺牲，他又深为同情。这种矛盾如此尖锐地刺痛了杜甫，也刺痛了千百年来每一颗温柔的心。明朝王嗣奭评“三吏”“三别”说：“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载之泪。”

他不再是那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了。生不成名身已老，老的是身，心却是愈老愈软了。他的眼睛不再只是朝上，而是更多地朝下看，透过乱世蝼蚁的悲凉、凄惨和挣扎，看向高居其位者的昏庸、无能和懦弱。

也是这一年，关中大旱，“谷食踊贵”，杜甫弃官携家避乱。他们从华州出发，七月，往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往成都。“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杜甫拖家带口到达秦州后，才发现那里并不太平，吐蕃军队趁唐军无暇顾及，屡屡侵犯边境，他寄以厚望的侄儿杜佐和友人也没能给他多少帮助。听说同谷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可他们到时已是十一月了，衣食无着，只好在山间捡橡栗、挖黄独来充饥，常常饿得倚壁呻吟。陷入绝境的杜甫不得不再次逃离，在深山峡谷中跋涉两个多月，终于到达成都。

“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在号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杜甫留下“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纪行诗，描画了最狰狞、最崎岖、最不为常人所见的险山恶水。那个一心要做大事“致君尧舜”的士子，那个手脚冻皴皮肉死的父亲，那个短衣数挽不掩胫的丈夫，一笔一笔写下他的落魄窘困，写下他的惨痛悲哀。

四

成都是当时闻名的繁华都市，玄宗就曾在此避难。

杜甫在浣花溪边觅得一块荒地，修筑了一座茅屋，称之为草堂。又从亲友处乞得桃树、绵竹等栽种在周围，很有些闲适清幽的样子了。被兵火和饥荒苦苦相逼之后，一家人终于有了一处安身之所。

在成都，杜甫得到不少亲友的资助。故人严武五年中两次镇蜀，不但在经济上资助社甫，还常常到杜甫的草堂与他作诗唱和。广德二年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啡鱼袋，这是杜甫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官阶（从六品上）。

“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心情变了，杜甫的笔下也有了平静清雅的田园之美。他不像李白，早就名满天下；他不像严武，可以马上封候；他也不像王维，有能力为自己建一个世外桃源。他在最好的年华里，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却惶惶然不遇于时，拙于谋生。

“醉里眉攒万国愁”的杜甫，终于迎来明媚亮丽的春天。三十岁那年，他娶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为妻，杨氏小他十一岁，知书达礼，温婉端庄。共同生活的三十年里，杨氏随着他颠沛流离，在常年的贫穷、动荡和艰困中，坚韧地承担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杜甫心中，她既有“乱世怜渠小，家贫仰母慈”的坚韧，也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的美丽。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信手画个棋盘对弈，可以共乘一叶小舟游玩，在一餐一饮的相濡以沫中，体会俱飞蛱蝶、并蒂芙蓉的浪漫深情。

杜甫在蜀五年，大体是较为安定的，但也有避乱奔走、衣食不周之苦。一次，狂风掀翻了他屋顶的茅草，他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个世间那样冷酷地折磨过他，他却依然有着火热的仁者情怀。

后人封杜甫为“诗圣”，梁启超却说他是“情圣”。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是的，他没有李白那样飘逸，也没有陶潜那样潇洒，虽然他也曾寻仙问道，也曾想恬淡隐居，但他的痛苦太深心事太重了，离乱的国，飘摇的家，有太多的牵挂、不舍和爱，要让他在人间遍历苦难。

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杜甫“涕泪满衣裳”，写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他想家了。当年严武入朝，他写诗相赠：“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入蜀本是迫于生计，对于朝廷所在的长安和故居所在的洛阳，他始终十分怀念。故国之思一发而不可收，杜甫作《秋兴八首》，一首比一首急切，一首比一首强烈，“孤舟一系故园心”，我随时准备登上我的船，我要靠它回到故园，它是我唯一的指望和依赖。

九月初，杜甫携家东下到达云安，风痹发作。他原来就有肺病、疟疾、消渴等百病缠身，只好留滞养病。第二年迁居夔州。时任夔州都督兼御史中丞的柏茂琳待杜甫甚厚，让他主管东屯公田一百顷，并买果园四十亩，然而杜甫的心情是压抑的。

四百年之后，陆游在此凭吊杜甫遗迹，不胜感慨：“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俛首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对于自许甚高的社甫来说，即使在严武幕府那一段黄金岁月，他还觉得“白头驱幕府，深觉负平生”，现在，以年迈之身，依附在柏茂琳这样的小军阀之下讨生活，怎么会没有委屈、辛酸？况且，安史之乱虽然平息，但代宗昏庸，宦官鱼朝恩权势日炽，吐蕃、回纥乘虚而入，藩镇拥兵割据，战乱频仍。他的老朋友李白、房琯、高适、严武等相继去世，他自己也已到风烛残年。少年时代的抱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求索一生却一事无成，现在，只能期盼年轻人接棒了，“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津思捐躯”。他多次赞颂诸葛亮尽忠王事，惋惜他“运移汉祚终难复”、“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沉痛写照。

“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乱世之中，生命是多么脆弱，寇贼、官兵、赋役、饥饿冻馁、奔窜流离、寒暑暴露，哪一条不会通向死亡之门，而回家的路其实漫长而无望。因为北上必经的商州一带，此时正烽火不熄，道路阻隔，杜甫不得不暂时放弃北归的计划。可“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哪里是归宿呢？大历四年（769）正月，杜甫过洞庭湖，沿湘江南下，去投奔友人衡州刺史韦之晋，到了衡州，才得知韦已调任潭州，折回潭州，韦已病卒。杜甫一家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了，只能在一叶扁舟之中栖身。大历五年（770）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据潭州作乱，杜甫只得驾着小船再度南下，准备投奔时在郴州为官的舅父崔伟，行至耒阳遭遇江水陡涨，被困数日后，他被迫放弃原计划，又掉转船头，再次沿江顺流而下。可惜这一次，他再也无力走出湘江了。

770年的寒冬，杜甫病倒舟中，作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做霖”。战火和鲜血依然在这个国家蔓延和流淌，处处充满了险恶，只恨自己一生功业不成，临死也没有能力安顿好家人，想到这些就止不住泪如雨下。

他是在感激，在告别，也是在郑重的托付。他至死都不能放下动乱中的国家、朝廷，不能放下他的妻子、儿女、兄弟，还有朋友。但是，他那一颗凄凉孤苦的浊泪，只能寂寞地洒在自己的衣巾。一直到他去世四十三年之后，才等到他的孙子杜嗣业四处筹措资金，将他的尸骨迁葬回十三世祖杜预的身边。

悲催的岳飞们：北伐咋就那么难？

文/张祖盛

公元1142年，岳飞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宋高宗赵构赐死，这标志着南宋彻底放弃北伐大计，从此赵氏王朝苟安南国，不思中原。岳飞的死，我们往往觉得是秦桧这个奸臣卖国贼残害忠良的结果，是由于赵构的昏庸无能。岳飞的英雄形象因为冤死而显得更加高大，他也被后来的人们当作神来供奉。

然而，现在越来越多史学界的观点认为：根本原因是南宋北伐撑不下去了，而岳飞是一个铁杆强硬派，只有拿他开刀，才能彻底断了大家北伐的念想，好好安生过日子。这种看法是有论据支撑的：一是北伐成本太高，南宋不堪重负，仅仅岳家军一支军队的军费支出就占了南宋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七，赵构为了凑军费恨不能把皇宫都卖了。二是北伐成果十分有限，当时根本看不到最终取胜的希望。岳飞最有名的“朱仙镇大捷”，是岳家军打到的最北的地方，而它仅仅在河南开封附近，距离关押徽钦二帝的东北地区还极其遥远。并且，岳家军能推进到这个地方还是在此前宋金议和，金国主动进行战略收缩、北撤的情况下取得的，不是岳家军一刀一枪一路杀到这里的。

成本极高、收益极低，显然一桩大赔本的买卖，赵构不是傻瓜，尽管北伐在政治上极其正确，他也只能走谈和妥协路线，先生存下来再说。岳飞，就是国家从北伐转轨到议和路线上的牺牲品。于是，南宋北伐就这么破产了。

如果退到一个更宏大的历史尺度上来看，你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中国数千年来，几乎没有南方政权北伐成功过的例子，南宋的北伐流产，是众多失败案例中的一个而已。比如，上古时期，南方部落首领蚩尤大战黄帝，兵败被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一度实力强劲，向北扩张，“问鼎中原”，控制了天下近一半的领土，但最终被西北的秦国所灭。三国时期，蜀汉诸葛亮连年北伐，屡战屡败，最后南方两国蜀吴均被灭。东晋时期，“闻鸡起舞”的名将祖逖挥师北进，失败。晚清时期，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出师北伐，全军覆没。唯一一次北伐成功的案例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战争，最后在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的情况下取得了象征性的全国统一。呃，朱元璋？朱元璋严格来说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一次汉民族大起义，不是南北两个割据政权的对抗。

不仅如此，大部分南方政权连北伐的动作都没搞过，苟且偷安，最后惨遭北方政权吞灭。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楚国、蜀国、吴国、东晋、南宋、太平天国等最终被北方所灭外，还有南北朝时期的陈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后汉、南唐，满清入关后的南明等等，最后都是这样的命运。最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明初的建文帝政权——它是个定都南方的政权，也被北边打来的军队灭了。朱棣成功篡权后，明朝也变成了一个定都北国的王朝。强有力的大一统王朝，秦、汉、唐、北宋、元、明（明成祖之后）、清，无一例外都是定都北方的政权，我们今天的中国也遵循了这个政治传统，定都北京。

于是，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南方打北方，咋就那么难？为何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愿终究是一场空？

打仗嘛，本质上就是拼资源消耗：人、钱、粮。中国文明发轫于北方中原地区，人口和文明也是从北方向南方扩散，早期南方打不过北方可以理解。但是，自北宋以后，南方的人口和经济都逐渐超过北方。与此同时。南方种稻，水资源丰富，单产高，粮食多。人、钱、粮，南方都不比北方差，为啥打不过？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因为南方人太软了，比不得北方的汉子孔武有力，吴侬软语嘛。而且南方的山山水把人的斗志给腐蚀没了，南方人没有血气性儿，“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西楚霸王项羽，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南方人。三国时期最厉害的猛将之一孙策，人称小霸王，南方人。明末抵抗清军最激烈的扬州、嘉定等地，南方地区。晚清最强战斗力——湘军及他们的boss曾国藩，南方人。抗战时期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川军，南方人……南方人不是孬种，在面对其他外敌入侵的时候，南方人的表现甚至比北方人更好。所以，从个人气质上，南方人并不比北方人软。

或许你会找历史上各种具体的人来承担责任，比如东晋后期的内乱，秦桧之流的奸臣盘踞朝堂不去，南方政权多为李煜这样的暗弱之主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人扯后腿，如果放手让岳飞、祖逖等忠臣良将去做，必然逆转乾坤，成就大业。

但是，历史中的所有具体人物本质上更多的是当时格局演化的结果，而非原因，所谓“时势造英雄”，个人力量对于历史演化的作用没有那么大。我们分析“南方很难打得过北方”这样一个大格局的问题，必须要超越具体的历史个案，不能拘泥于分析某个人的是非得失。今天，笔者就试图以宏观的视角来提出对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当然这仅仅是充满我个人偏见的答案。

一是正统性。北方具有强大的正统性优势，而南方“王气”不足。华夏文明起源于北方，夏商周三代奠定了中原文明的中心地位，入主中原，才能算得上是天下共主。因而，占据北方的政权，往往具有天然的正统性，而相比之下的南方政权则常常是一种割据心态。从心理气势上，南方往往输给北方。

二是战略纵深。北方背靠欧亚大陆中心区，战略纵深大，南方东南滨海，回旋余地小。南方打北方，北方政权如果战事不利，有得是后撤的地方，而南方政权一旦前方战事吃紧，往往退无可退，很容易速亡。蒙古大军南下时，南宋最后的小朝廷就是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跳海自杀。南明也一样，最后的皇帝逃去缅甸，被吴三桂所杀。缺少战略纵深，是南方对抗北方时的致命伤。

三是气候。北方人容易适应南方气候，而南方人很难适应北方气候。北方人往南打，一路脱衣服就可以了，大不了多洗几个河水澡，连酷寒地带来的蒙古人、满族人都能适应。而南方人往北打就惨了，越深入北地，越难适应，衣服、鞋子等都会成为致命的问题，这也是南方军队很难深入北方的原因。

四是地理条件。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口音为标准音”，这里面“北方方言”的意思是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等地，大家说的口音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互相能听懂，本质上属于同一种方言。南方呢，四川话、湖南话、湖北话、闽南语、客家话、广东话、江浙话等等，彼此基本上不能沟通，而且各个方言内部又有无数变种，差异也极大。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南北各自的整合程度完全不同，北方连成一片，南方四分五裂。本质上，这是地理条件导致的，北方地势平坦，大多是广袤的平原和高原，人们互相交流很便利。而南方山峦重叠，河道纵横，各区域间互相割裂，交流很少。

整合程度高低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征兵问题，北方很容易拼凑起一个规模极大的军队，而南方呢，往往各省各地割裂开来，形成很多股小规模军队。比如赤壁之战，曹操20万兵马，而孙刘联军不足5万。淝水之战，北方军70万，南方8万。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听到了以南方省份命名的军队，湘军、川军、淮军、粤军等等，但你几时听说过鲁军、冀军、陕军呢？因为南方割裂，北方连成一片嘛。二是认同度的问题，整合程度低，导致南方内部分裂严重，即使有一个相对强势的集权政体存在，但仍架不住内讧，各自为战，很难形成合力。历朝历代，南方政权内部很容易出现内讧就是这个原因。自然，这也会伤害南方军队战斗力。

五是少数民族。北方有很多强大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少数民族力量很弱。少数民族一方面威胁汉族政权的安全，另一方面也给汉族政权注入外来基因，这种“杂交”后的汉族政权更加强大。比如唐朝的李氏，就有鲜卑血统。北方人和西北少数民族长期以战争、通婚、贸易等形式的交流，不断摄入武力方面的基因，自然也越来越强。而南方政权呢，却缺少这种强有力的外来基因做补充，当地的少数民族要么规模太小，要么毫无好战基因。此消彼长之下，北方政权就更加强势了。

当然，近现代社会来临后，上面那些原因也就逐渐土崩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武器水平、军队训练水平、战争融资等因素变成了更加重要的取胜关键点，这也是为什么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中南方政权能取得胜利的部分原因。本质上是现代社会来临后打破了旧有格局，游戏规则已经被颠覆了。

于是我想起了某个牛人的话，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

众星拱月——刘秀与云台二十八将

文/古月今尘

东汉开国功臣有云台二十八将，是永平三年（60）汉明帝刘庄选定的，主要是跟随光武帝刘秀南征北战的将领，没有文臣在内。刘庄效仿汉宣帝图画功臣十一人放置在长安未央宫麒麟阁，同样图画他们的形象放在洛阳南宫云台，因此得名。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当时图画形象的还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人，只说二十八将是为了上应二十八星宿，两汉习惯于将人事比拟天象，这也算是其中一例。

这二十八人，被放在《后汉书》卷二十二末，排列顺序大体按照功劳，比起后世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他们没那么有名，原因很复杂，有人认为是年代久远导致民间流行的演义小说更愿意以二十四功臣为主角，有人认为是东汉战争太少导致他们军功不显，都有道理，但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刘秀驭下的需要，导致二十八将智勇不能够充分展露，使得东汉初年时势只造出了刘秀一个英雄，其余人不得不主动退让以免祸。